

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1)
宁粤合作亲历记		陈铭枢(38)
“非常会议”前后		周一志(71)
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		孟 曦(86)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下台又上台		贺贵严(95)
短稿十篇		
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		恽宝惠(101)
郑汝成之死		陈一叶(102)
袁世凯之死与唐天喜之背叛		陶树德(103)
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的经过		邓汉祥(104)
黄埔五期“清党”的回忆		郑庭笈(105)
九六公债发给利息的一段公案		周士现(106)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反蒋的一个起因		南桂馨(107)
回忆张家口抗日同盟军		魏自愚(108)
李生达之死		王尊光(109)
关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的一些补充 ...		宋希濂(110)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		王化一(112)

东北抗日军进入新疆后十年中的遭遇 张凤仪(127)

附注

对《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二辑、第十八辑

对《宁粤合作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二辑

对《“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第二十三辑

对《郑汝成之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第三十四辑

对《东北抗日军进入新疆后十年中的遭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

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

在旧中国,大公报是创刊比较早也比较重要的报纸之一。它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敛之。到一九一六年九月,英敛之将大公报盘售与王郅隆。王郅隆接手经营后,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九个月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续刊,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大公报于六月十七日发表《新生宣言》,宣布大公报归于人民所有。由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旧大公报共有四十七年历史。我们记述旧大公报的历史,拟分为两段:前段记述英敛之经营的时代,而将王郅隆续办的时代附入,统称为“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后段记述吴胡张时代的旧大公报。这里谈的是前段。

一九〇二年这个历史年代

旧大公报创刊于一九〇二年的天津,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一九〇二年是个重要的历史年代。这年是庚子年义和团起义的第三年,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大公报创刊的日子,距离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城(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不满两年,距离辛丑条约的签订(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还不满一年。这时候,天津还被八国联军占领着,由八国联军所组织的“都统衙门”统治着。大公报在这时候创刊于国破民奴的天津,而日报馆就设在天津的法

国租界里,真可谓不平常。

庚子起义,是由反帝反教而起。天津人民曾经掀起两次反帝反教的大风暴:一次是一八七〇年火烧望海楼的教案,再一次就是庚子起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天主教徒假借洋势欺压同胞,就诉诸烧教堂打教徒的直接行动。旧大公报创办于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天津,而且是由天主教徒主办,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自然是很清楚的。

时代是在二十世纪初,这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初步形成。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完全由民间举办的厂矿企业,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已有一百二十二家,资本总数为二千二百七十七万元^①。戊戌变法,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的演出。这时候,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发展,戊戌变法的思想正深刻地影响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大公报创刊的编辑思想,也反映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这是为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英 斂 之 这 个 人

英斂之(一八六六——一九二六)这个人是很自负的。他在壬寅(一九〇二,即创办大公报的那年)日记的扉页上题着这样一首诗:“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

英斂之,姓英名华,字斂之,又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②,一八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二至三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关于英斂之是否满洲旗人,曾经考证。《清史稿》中《文苑三》《斌良传》内附有《英华传》云:“英华,字斂之,赫佳氏,正红旗人。”赫佳氏是满族的姓氏,如爱新觉罗氏、叶赫氏、瓜尔佳氏等。英斂之和金梁友好,金梁参与《清史稿》的编纂,遂将《英华传》编入《清史稿》。这个短短的传稿是经过英斂之的同意的。据《钦定八旗氏族通谱辑要》上卷三十七页载:“赫佳,原注,赫佳为满洲一姓,其氏族世居雅兰及讷音地方。”英斂之是满族人是毫无疑义的。

六六年生于北京。他的妻子是皇族,姓爱新觉罗,名淑仲。英敛之幼年家贫,出身寒微。据说他的父亲和长兄都是体力劳动者,英敛之自我奋斗,读书靠自修。由他起,英家转换了门庭。英敛之的文集《也是集》《自序》说:“仆以一武夫,不屑于雕虫刻篆。顾石可掇三百斤,弓能挽十二力,马步之射十中其九,每借此自豪。然此等伎俩,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逐弃之。弱冠后知耽文学,则又以泛滥百家、流览稗史侈渊博;甚至穷两月之目力,读《四库提要》一周,亦足见其涉猎之荒矣。”他所以习武,因为旗人照例要学武,并且可以入军籍,得粮饷。他少年时致友函中有一节说:“予以家贫亲老,无以为养,兼之多事待了,债负满前,每以拙于生计为忧。故自挽弓操臂,俟挑入勇时,得补粮饷,尚为一线之路。所以不惮烦劳,每日挽六力弓逾百膀也。但祝彼苍,悯予苦心,曲赐矜全,则一枝有托,不复奢望矣。”可见他少年习武是为了生活,苦读学文,希望得到一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英敛之自二十二岁信奉了天主教^①,自习了一些法文,从此和天主教以及一些外国神甫发生了关系。据说英敛之在三十岁以后才结婚,这时他已经成了文人,经他学文的老师介绍,与爱新觉罗淑仲结婚。英敛之的《也是集》内附有淑仲在戊戌(一八九八年)所作的诗四首,韵律甚工,文化程度很高,不是寒家女子。英敛之以一个满洲旗人,生在满清末季,朝廷腐败,外患严重,他一面恨家国不振,同时接触到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因此在崇洋思想中希望变法维新。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英敛之也在戊戌三月(一八九八年四月间)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议论国事。文中把北京谚语所说: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阐释;文章并附和了康有为的政见:“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

^① 据英敛之《杂存稿》中《曾侯日记书后》一文中说:“予自二十二岁信教以来,至今已近五载。”——八九二年壬辰年作。据此知英氏生于一八六六年,并自二十二岁信奉天主教。

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顶到这年九月“戊戌政变”,慈禧再出训政,光绪被囚,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康有为逃亡,英敛之恐被株连,也逃至天津,搭太古“重庆”号轮船去上海。他在船上遇到康有为,彼此交谈,不知姓名。这可见当时他和康梁维新派还没有联系。据现在的英敛之的日记,他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得到了一个职业,充当法国驻蒙自领事馆的馆员。蒙自县在云南南部,滇越铁路经行其地,一八八七年依据《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辟为商埠。英敛之于一九〇〇年二月初偕法国领事从天津启程,经过上海、香港、海防、老街至蒙自。英敛之到蒙自的时候,法国正在筹划建筑滇越铁路,他在蒙自帮助法领事购买民间土地。在蒙自地方,法国和天主教的势力已深深侵入,在英敛之等到来之前,蒙自曾经发生过烧教堂打神甫的反教事件;英等到后,又传当地人民将继续起来闹事。因此法领事要求中国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调法国兵来保护领事馆,中国未允。随后听到义和团在北方起义以及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北京的消息,英敛之感到心神不安,想辞职北返,另寻职业。法领事也担心地方不靖,决定离开蒙自。在七月中旬,英敛之随法领事离开蒙自,经越南、香港、上海,于八月下旬回到一片残破的天津。到九月中旬法领事准英辞职,给他最后的一次薪水五十元完事。英在天津勾留了一个多月,因大乱之后,津京交通多阻,未能去北京,在天津也寻不到职业,乃于十月中旬借法国“白神父”南行之便,同船到上海。英到上海后,也找不到职业,妻儿相随,开销不小。他先给一个名叫“温伯彦”的英国人教“官话”,以后又给华俄道胜银行的一个比利时人“欧某”教话,又给荣华洋行一个名叫“翁德林”的德国人教话。每天早午晚分三次到各处各教话一小时,翁德林月送“束修”十元,其他二人的学费大概也是这个数目。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无聊的。在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英敛之又从上海回到天津。

这次回到天津,情况不同了。一个天主教徒资本家柴天宠提议集股开办一个报馆,由英主持。此事极为顺利,经过一年多的酝

酿筹备,到转年(一九〇二)夏就创刊了《大公报》。一九〇五年夏英敛之应日人之邀,游历过日本。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到一九一二年,“大清”皇朝倒了,民国成立,他就没有办报的兴趣了,从此退休,移居北京香山静宜园。至一九一六年将大公报出兑给安福系资本家王郅隆。(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由提议到办成的具体经过,详述于下节。)

英敛之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后,专心钻研天主教义。因所居静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报纸上所写的论文,出版了一本《也是集》。英因主持大公报而驰名,退休后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首领,当时有“南马北英”之说。南马是马良,字相伯。英、马二人有几十年的交情。英和熊希龄的关系也好。一九一七年华北大水灾,熊任赈灾督办,在北京设慈幼局,聘英为局长。一九二〇年慈幼局移香山,更名为香山慈幼院,英不久即辞职。英在香山设立“静宜女学”,又设立“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宣传天主教。英敛之又以美国的关系,在北京设立“公教大学”,后改为“辅仁大学”,自任第一任校长。英晚年在北京办教育,办慈善;每年冬天募赈款,在香山开粥厂,赈济贫民,所以在地方上颇得附近居民的好感。英敛之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在北京病逝,年六十岁。

当时这个报的阶级背景

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是由一个受天主教教养的具有保皇立宪思想的满洲旗人,利用天主教和法帝国主义的势力和一部分金钱,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等的投资办起来的一家报馆;这可说是一个以满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结合法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等的混合物。

英敛之夫妇都是清皇朝的本族,出身于天主教徒,深受天主教的影响。英又结交了许多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他个人也变成一个

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英敛之一身表现着两个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另一个是阶级矛盾。在民族矛盾方面，他坚决站在满族保皇的立场；在阶级矛盾方面，他一般地是跟着买办资产阶级走。英敛之最初的一个职业（驻蒙自法国领事馆馆员）就来自天主教的关系，所往来接触的尽是中、法、比各国的天主教人物；当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潮的影响，头脑里搞成一套君主立宪的思想体系，以为救国之道只有保皇立宪以永保“大清天下”的一条路。英敛之的言论主张，主要在于保皇立宪。他呼吁慈禧太后撤帘归政，拥护光绪皇帝亲政；在保皇的条件下赞成维新，坚决反对共和革命。他是个满族保皇派，他的保皇主张，比康梁还坚决得多。为了实现保皇立宪的理想，为了达到永保“大清天下”的目的，他就利用帝国主义的势力，投靠洋人。英敛之头脑里有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保皇与崇洋。他保皇保到辛亥革命以后，“大清”皇朝完了，就洗手不办报了；崇洋崇到满脑子的“二毛子”思想。

我们研究旧大公报的历史，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它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旧大公报在一九〇二年创刊于天津，馆址在法国租界，报头上加刊一个法文名字“L'Impartial”（无私的意思），决非偶然的事情。我们最初总以为英敛之是天主教徒，主要的股东也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与法国有特殊关系，所以旧大公报就沾染上亲法的色彩。现在明白了问题真相并不这么简单，而是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在政治上托庇于法国的势力，在经济上也掺入了法国的金钱。据英敛之的辛丑日记，他在一九〇一年春天由上海回到天津，环境是国破家亡，个人情况也极其无聊。他回天津的第三天（四月二十六日，旧历三月初八日），首先去看柴天宠，并送了一些礼物给柴，柴约他到家里吃午饭。日记上即说：“柴先生等愿设报馆，约予主持其事，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赔垫云云。”柴天宠，字敷霖，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总管。柴是个天主教资本家。他最初经营一个“天和号”，专售建筑材料，并承包各种建筑工程，由于

承包天主教堂及教堂房产的工程发了财。紫竹林教堂的产业和外交事务皆由他负责,并兼管教务,总管一切。由于有钱,他还投资经营各种工商企业。另一个大股东是王郅隆,字祝三,天津东大沽人。他的先人是代粮商掌管运粮船的,他本人做粮食和木厂的掮客,又经营元庆木号兼包工,因此与柴天宠有联系。王好赌博,会“吃腥”(赌博作弊骗人),在赌场上赢了很多钱。他就因为赌博的关系,联系上北洋军阀,特别勾结上倪嗣冲。倪嗣冲任安徽督军时,委任王郅隆在天津设安武军后路局,以王为总办。王以整列火车运大米到天津,不出运费,把米卖给日本,大赚其钱,成为安福系的官僚资本家,是个亲日派。英敛之于一九一六年把大公报卖给了王郅隆。据说王郅隆购买大公报馆,钱也不是他自己出的,而是安福系几个大头目在天津安徽会馆赌博抽的“头钱”。天津方面拿钱入股的重要人物,还有张连璧,字少秋。他和他父张丹秋两代经营德商荣华洋行买办事务。荣华洋行经销德国五金颜料杂货,所以张氏父子又先后开设恒义号洋广杂货店、万聚恒洋广颜料店、瑞记布庄等,接售荣华洋行的来货。张连璧很有钱,现在天津承德道上的“连璧里”,就是张所建造,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此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股东名李敬宇,天主教徒,是天津法国领事馆的高级翻译,此人后来入了法国籍。柴天宠一面在天津募股,英敛之一面到北京按照天主教的教规向法国主教“请示定夺”。法国“樊主教”(华名樊国梁)赞成办报,并入十股。一九〇一年八月四日(旧历六月二十日)日记云:“进堂望弥撒讫,遇樊主教云:……法钦使亦愿入报馆股,但愿开于京中。予思有法钦使,规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觉灵通,但天津诸友必以为不便设于京中,恐多不愿入股者,俟后商之可耳。”^① 这里所记的法钦使,就是签字于辛丑条约之上的法国公使鲍渥(樊主教所入的十股是多少钱,以及法国公使入了多少股和多少钱,现尚无从查考;英敛之对法公使的入股是很重视的,

^① 有图为证。

他的日记说“予思有法钦使，规模固可扩大”，可见一斑）。英即函询天津柴天宠，柴复函云：“设馆无论京津，津友皆愿，但求勿拒我等入股本，为幸。”这说明柴等是愿意同法国公使合伙开这个报馆的。事情还有曲折，八月十七日（旧历七月初四日）日记云：“由津至京，进堂见樊主教云：当速办，现已令人画房样。始知欲设堂中，大不便，然未遽驳，俟商之津友。”法国人同中国人合伙办报，要把报馆设在北京天主教堂里，的确太笨了，而英敛之却“未遽驳”。他写信问天津，柴天宠李敬宇来函，皆不赞成设于教堂中。八月二十七日（旧历七月十四日）日记云：“复见主教，蒙示以现与钦使商妥，立于津上为便。予即云：此事已定，愈速愈妙。”这可见公使比主教高明。大局既定，英即回天津，携带款项到上海订购机器聘请主笔去了。

英敛之九月二十一日到上海，二十四日即至中外日报馆访汪穰卿，请汪代荐一位主笔。汪穰卿名康年，是上海当时的名士。^①在英请汪荐主笔的一段交涉中，证实旧大公报接受了洋款，因此使汪穰卿等羞与为伍。此事值的一记。汪穰卿推荐了一位姓蒋名智由字心斋的堪

二十日
星期
使公使入報館設在天津
予思有法欽使固
可大辦消息之說
然天津津友必以為不便設於堂中
恐多不願入股者俟後商之可耳

（英敛之日记）

为主笔。^②十月五日(旧历八月二十三日)晚,汪穰卿在四马路万年春设宴介绍英、蒋见面。同席者还有:杭辛斋、廉惠卿(此二人正筹备在北京办报,到上海购机器)、汪建斋(名立元,是汪穰卿的族弟)、梁幼海、史子岩、朱志尧^③。英的日记说:“穰推予首座,予未肯,饭时极久,旋陆续去。穰及建斋与蒋向予力陈入洋股之弊。”^④这是汪蒋三人劝英勿用外国人的钱办报。转天,十月六日(旧历八月二十四日)的日记说:“书致穰卿一函,告其不能却洋款情由。”^⑤这是说他办报不能不接受外国人的钱,而且是法国公使的钱。从此聘请主笔的事就发生了波折。据英斂之的日记,十月八日(旧历八月二十六日):“晤蒋心斋,询其愿否北上?答云:恐难得昌言之权,故不愿去。予乃告以论说准各具名,不相混淆。俟后再议。”十月十日(旧历八月二十八日)晚,英在江南春宴客,主要的客人是汪穰卿和蒋心斋。“蒋告现同赵祖德开办《选报》,不能北去。”蒋心斋谢绝了英斂之的

归国书至山點赴四馬路萬年春汪穰卿約同席杭惺齋廉
惠卿係在東設報依才必犯英汪立元建齋穰卿族弟梁幼
海陝籍生京中蔣智由心室即汪若予生筆者史子岩致
堯及予穰推予首座予未肯飯時極久旋陸續去穰及
建齋與蔣向予力陳入洋股之弊曰已十點半
早九點進至萬年春設報說至負義者建齋果語後至生
市山西田治直話至長德棧由史子岩伯年以情願可同

(英斂之日记)

邀请。英此夜“卧不成寐”。此事原可至此而止，忽然异峰突起，十月十三日（旧历九月初二日）的日记说：“是日得志尧函云，汪穰卿毛遂自荐，愿去本馆，明日可将合同示予。予得信甚为诧异，意其别有隐衷。日前力阻予，万不可入洋股，谓定遭压制，今反欲就何也？然予以为苟有益于报事，不妨曲从之。因其交游博，声誉隆，既消息灵通，复销售宽广，虽月出百金以上，犹为得也。岂不较碌碌凡庸远过十倍哉？”十月十六日（旧历九月初五日）日记云：“汪穰卿寄所订（拟）合同来，见其欲独揽大权，薪水但索五十元。”英是夜又“卧不成寐”，“挑灯作复穰卿信，并酌改合同。但其与设报宗旨不背，一切小节，予颇可曲从，因开创需人，伊又为老手故也”。十月二十三日（旧历九月十二日）的日记云：朱志尧转到汪穰卿函云：

① 汪康年，字穰卿，是《时务报》的中心人物。《时务报》创刊于一八九六年，梁启超任主笔，汪任经理。一八九八年汪另出《时务日报》，后改为《中外日报》。英敛之到上海聘主笔时，汪正办《中外日报》。汪以后又在北京办《刍言报》。汪属于强学会系统，是保皇派。

② 蒋智由，字心斋，别号观云，他的儿子蒋尊簋在民初做过浙江都督。蒋智由是上海文化教育界有名人物，他曾同蔡元培、林少泉等发起中国教育会，借此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工作。中国教育会分子开办爱国女学，蒋被推为经理（当时无校长名称）。蒋智由当时被目为新党，他当然不肯帮助英敛之去办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报了。

③ 朱志尧这个人很重要，是英敛之在上海的几十年好友，与旧大公报有密切关系，是旧大公报的股东。朱志尧（名开甲），是马相伯的外甥，生长于累代天主教徒的家庭中，他本人也是天主教徒。在旧大公报创刊时期，他已在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中服务，以后在这个代表法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银行做了几十年的买办。他是个买办资本家，上海求新机器造船厂是他投资创办的，以后又陆续搞别的企业。他曾投资开办上海南市华商电车公司，因此上海南市的电车大部分是由求新机器造船厂制造的。这个人是上海天主教徒中典型的买办资本家。现在见到朱志尧的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下列的十项职衔：“教皇钦赐圣西尔物斯德贵骑尉勋位；三等嘉禾章；上海总商会费城赛会代表；上海公教进行会副会长；上海华商电气公司董事；上海大通轮船公司董事；上海求新机器造船厂董事；安徽宝兴铁矿公司董事；上海新祥制造机器厂主任；上海同昌纺纱榨油公司主任”。其中单单未列东方汇理银行华经理的职衔，大概是有所讳吧。

④⑤ 同见一张图。

“所议不符初约，深恐不易措手，只得敬谢不敏”云云。汪已明白谢绝了，但英仍不死心，日记续云：“予见其前日晤商情形，似有成议，意其今故作波澜，以要挟大权独握也。”二十六日（旧历十五日）日记云：“予意如无合适主笔，可姑允穰卿襄办一年，彼时再作打算。”二十八日又到汪穰卿处面商，“以索薪水太昂，故不能延至”。这是汪穰卿以索高薪的办法打断了这段交涉。英敛之欲聘蒋、汪二人，先后失败，求计于马相伯，马建议商之张元济（字菊生），另荐他人。英曾几次访张，张不肯荐人。十月三十一日（旧历九月二十二日）日记云：“马公（相伯）柬云：得张菊生函云，报出自旗人，尤难。自当尽力襄助，主笔任重，未敢轻举，好在尚有时可商，当加意为之访问云云。”这是说，张菊生不愿意给满洲旗人办的报推荐主笔。英敛之这次上海之行，订购了机器和铅字，请主笔的事失败了。他于十一月三日登上回津的轮船，在船上阅读《天演论》。五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日记云：“竟日卧，头闷，大不快，甚悔此次之行为大寻苦恼。”

英敛之回天津后，往来津京，筹备报事。十二月初又到上海，仍求汪穰卿介绍主笔，汪这次推荐了一位方守六，条件谈妥了，订了合同，于一九〇二年四月上旬同船到了天津。方守六是帮助英敛之创刊大公报的第一位主笔。

锣鼓渐渐紧了，大公报馆要开张了，英敛之于五月三日（旧历三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天主教堂访樊主教。此日的日记云：“晤樊主教云：法钦使已应保护之事。”这是法国公使鲍渥正式应允保护大公报了。距离大公报出版第一号报的前七天（一九〇二年六月十日，旧历五月初五日），天津法国领事馆的高级翻译李敬宇，“以工部局告示囑印，旋印成送去”（据英的日记）。大公报的新印刷厂还未印报，先给法国工部局印了告示，可见英敛之的大公报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了。

从这段办报缘起看，英敛之原无办报之意。他于一九〇一年春天，在上海穷极无聊，回到一片残破的天津，他所汲汲以求的，只

是要谋得“一枝有托”，以解决职业和生活问题。是柴天宠提议办报馆，并愿“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赔垫”。据英敛之日记，在柴天宠提议办报的一个多月以后，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五日（旧历四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云：“张寿峰来，告以刘铎来，遂至堂，候有时，晤，刘铎闻主教等议，令予至北堂办理要紧文件，薪水从丰云云。予谓此间报馆事已有头绪，中辍颇为可惜。”这是说假使不是柴天宠提议办报在先，英敛之的职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天主教堂为主教办理要紧文件了。

大公报的最初馆址设在天津法国租界狄总领事路（Rue Dillon，一名六号路乙，即现在天津哈尔滨道四十二号），对门就是法国工部局，隔一条街就是法国领事馆，当时八国“都统”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国 General Jefeve。大公报就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旧历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天津，受着法帝国主义的直接保护而诞生了。第一号大公报印了三千八百份。

英敛之是旧大公报的主要创办人，他自任总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英本人是满族保皇派，又是天主教徒。倡议办大公报和最初的投资人多数是天主教人物。此外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翻译《天演论》也主张君主立宪的严复就入了一千元的股。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的大公报登有通知股东“改用新票……分派红利”的广告，可见还有若干小股东，大概都是天主教徒和资产阶级分子。从阶级关系来看，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乃是一个以满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结合法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等的混合物。旧大公报既是这样的阶级产物，它就为这样的阶级利益服务，这就规定了旧大公报言论编辑的方针和内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旧大公报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

近代的中国新闻事业，在初期比较站得住脚的报馆，几乎都同帝国主义有关系。上海申报开办于一八七二年，是英国人美查办

的；上海新闻报开办于一八九三年，是英国人丹福士办的，以后于一八九九年为美国人福开森接盘。后起的天津大公报，表面上是中国人办的，而骨子里是法国人同中国人合办的。不把外国资本表露出来，这是英敛之比较高明的地方。这几家报馆，都设在上海或天津的外国租界里，已非中国行政权所能管辖，而且还有帝国主义的直接关系，更有恃无恐。这几家报，若是没有帝国主义的势力撑腰，它们是很难持续存在下去的。以大公报而言，它一创刊，就放言要慈禧太后撤帘归政，若不是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天津，英敛之是首领难保的。以袒帝者反对媚后者的关系，英敛之的大公报一贯反对袁世凯。一世之雄的袁世凯，直隶总督的交椅摆在天津，他对英敛之无可奈何，只能在租界以外禁售大公报；英敛之和大公报却以此得“敢言”之名。以后杨士骧任直隶总督，那就更不足畏了。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九日（旧历九月二十五日）英敛之的日记说：“方药雨^①来言：吴箴孙向彼言，杨督谓我报讥彼，大怒。本欲交涉，因不便，遂止。托嘱此后务留情面云云。并订游孙家花园。”两天后（旧历九月二十七日）日记云：“晡，孙仲英以马车来迎予至彼花园。时以昏黑，引观各处，方药雨亦至，二人同劝慰，此后淡视国事，随时游戏，为佳。留彼饭，意甚殷殷。”这可算得一幅官场现形图，上面画着倚仗洋势的大主笔和帮闲的政客豪绅，背后站着帝国主义洋大人和中国大官僚。“淡视国事，随时游戏”，确是帮闲的妙语。

英敛之和旧大公报最初是亲法的，后来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关系，转而亲日。一九〇五年夏初，那时日俄战争尚在进行，日本为了拉拢大公报作它的宣传工具，曾经邀请英敛之到日本游历了两个多月，从此旧大公报上就大量出现了亲日的言论和报道。

^① 方若，字药雨，日本在天津开办的《日日新闻》报的社长兼主笔，亲日买办文人。一九〇五年英敛之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关系，就是经过方若的牵线。此人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在天津当了汉奸。

特别是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小村寿太郎到北京同清政府会议东三省条约的时候,旧大公报大卖力气,替日本帝国主义作虚伪宣传,欺骗中国人民。在这一时期,英敛之的日记上记载同日本方面的交际特别多,往来京津,奔走于日本使馆、六国饭店和日本领事馆之间,经常同日本领事馆两个高级官员高尾亨和小村俊三郎往来,给伊集院总领事夫人送礼,为神尾提督写大字,以至同日本人一起吃花酒,叫姑娘,等等。就在英敛之和日本帝国主义交情浓厚的时候,一九〇六年三月初,法国方面忽然通知馆房转了主,法国领事馆高级翻译李敬宇也要求撤股。英敛之和柴天宠、王郅隆三人商定将报馆迁到日本租界,借款建房,于这年的九月五日迁至日本租界新址出版。从此旧大公报就完全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庇护。旧大公报以后转入亲日的安福系官僚资本之手,已在这时奠定了基础。英敛之和旧大公报由亲法到亲日,以及大公报馆的搬家,必有政治原因,我们在下文《由亲法到亲日》一节有些分析,请参阅。

英敛之经营旧大公报,实际只有十年时间(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二年,“大清”皇朝倒了,“民国”成立,英敛之这个坚主君主立宪的满族保皇派没有心思再办报了。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旧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他从此隐居于北京香山。至一九一六年九月,英敛之将大公报盘售与安福系财阀王郅隆。

王郅隆购得大公报,自任总董,聘胡政之为经理兼总编辑,以后变成了安福系的机关报,言论编辑表现浓厚的亲日色彩。这样的报,当然为读者所厌弃,销数惨跌,最后弄到没有人看了,每天只印几十份,贴贴报馆门前的阅报牌和送给有关的人看。王郅隆于一九二三年去日本,死于关东大地震。这个报又拖了两年,实在没法再办下去了,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